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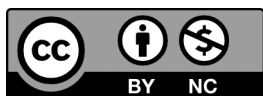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潘梓年

潘新伯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潘梓年（1893-1972），《新华日报》第一任社长，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



▲讲述人：潘新伯（潘梓年之子）

在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潘梓年一直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始终奋斗在党的新闻、教育战线最前沿，其坚贞不屈的革命操守，严谨谦和的学者态度，奋斗不懈的苦干

作者简介：潘新伯，潘梓年的长子，曾任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总经济师。

文章引用：潘新伯. 我的父亲潘梓年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3, 4 (3): 4-8.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3002>

精神，着实为人所敬佩。

董必武写诗赞他“如君党性实堪钦”，著名社会学家邓初民则赞他“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

一、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

潘梓年出生于宜兴陆平村的书香门第，五岁起就在父亲任教的私塾里读书。后来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产生了追求新知识新文化的强烈愿望，他先后到上海和苏州学习外语和现代文化知识。

1920年，潘梓年到北大哲学系做旁听生，主要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鲁迅主讲的新文学对他影响极大。当时的北京大学，“五四”的革命思潮如巨涛奔涌，《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广为传阅，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新的世界观在他的头脑里逐步形成。

此后，他被介绍到当时颇具名声的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当时该校部分师生成立了一个“保定育德中学文学研究会”，专门请他去做新文学的讲演，他先后讲了8次，深受师生欢迎。他的讲演记录很快被整理出来，由当时的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书名为《文学概论》。这本书从1926年第一版起共出六版，发行近5万册。

在宜兴城区光荣西路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二层小楼，北门门楣上有阳刻“补庐”二字。1927年4月，潘梓年等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潘梓年负责宣传工作。5月，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宜兴特别支部，潘梓年为特支委员。经党组织同意，他担任了当时的宜兴县教育局局长。从此，他利用公开身份，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教育界的团结、争取工作。他奔走于南京与宜兴之间，在陆平村筹办农民协会“同乐堂”，为宜兴秋收起义作了许多准备工作。

二、《新华日报》的首任社长

1937年6月，经过党中央坚持不懈地积极营救，潘梓年等一批政治犯终于出狱。出狱后，党组织立即安排他回上海，他在那里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慰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让潘梓年和章汉夫一起去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党中央决定由潘梓年任《新华日报》第一任社长。

“国民党反动派允许《新华日报》在它的统治区出版发行，也是和它的抗战一样，和共产党合作一样，是完全出于被迫。从报纸的筹备出版起，就一直遭到反动派的重重阻难。报纸是于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备的。当时反动派估计我们两手空空，而一切又都在它的严控之下，

要出版一种日报是不可能的，因而口头允许，实际阻挠。不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机器、纸张一应俱全；试版送审，使它大吃一惊。”（见《潘梓年文集》）

这一年的11月，眼看南京即将失守，报社被迫搬到了武汉。1938年1月11日，第一份《新华日报》出版了，那一天，正好是潘梓年的45岁生日。



▲《新华日报》首任社长潘梓年（中）、总经理熊瑾玎（左）、总编辑吴克坚（右）在工作中

1938年10月，眼看武汉又要失守，《新华日报》又被迫迁往重庆。当潘梓年奉命和李克农率领《新华日报》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搭乘江轮“新升降”号向重庆撤退时，在嘉鱼县燕子窝附近，遭日机多次轰炸，江轮被击沉，25名同志不幸遇难。潘梓年的胞弟，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潘美年，也不幸在这次袭击中身亡。潘梓年忍着悲痛，带领幸存同志颠沛辗转，历经万难才抵达重庆。背负国仇家恨的潘梓年，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是我党从事政治、外交、文化、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力武器。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至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没有一天，国民党不在想方设法扼杀这张报纸。而作为《新华日报》社长的潘梓年，他没有一天不是站在最前沿，与国民党的限制、破坏、阴谋作斗争。

在9年多的时间里，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数百篇社论、专论或其他署名文章，以手中之笔为武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刻揭露国民党制造分裂、妥协投降、镇

压民主、反对共产党的各种阴谋，为争取抗战胜利呕心沥血。

三、哲学领域的开拓者

潘梓年是我党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7年，他就翻译出版了美国琼斯的《逻辑》一书。

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期间，他始终不忘哲学研究。1937年，潘梓年刚刚出狱，就在狱中文稿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此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等见解相当独到，至今仍在和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哲学讨论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1954年，潘梓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了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推动全国的哲学研究，亲自筹备出版了我国第一份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成为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阵地。

此后的10多年中，潘梓年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哲学研究上。“1956年制定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他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强调，哲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但‘目前从事哲学研究的队伍还很小，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哲学专家特别缺乏，哲学中的许多学科还是空白和薄弱的’，并提出了培养干部、扩大队伍、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空白学科、整理遗产和出版专著与通俗读物等迫切任务。”（见宜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所编《潘梓年》一书）

潘梓年也十分重视国际上的学术交流。1957年，他率领由冯友兰等组成的新中国第一个哲学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由“国际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与来自20多个国家的几十位哲学家共同讨论“思维与行动的关系”。他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对思维和行动关系的看法》的发言，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哲学界影响巨大。

潘梓年在学术理论上勇于探索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1962年退居二线后，他打算集中力量搞研究，准备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逻辑学》。不幸的是，受“文革”冲击，他在学术上的研究成为泡影，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尽管如此，潘梓年在学术领域的谦虚、严谨的作风，以及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的风范，一直被后人所敬佩。

四、卓越的教育实践家

在教育实践方面，潘梓年也做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区建设又急需大批干部，因而决定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原解放区成立一所革命大学，培养和造就一批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党中央决定开办中原大学。

1948年8月，中原大学（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正式成立。潘梓年被派到中原大学，担任该校的副校长，校长为范文澜。校长范文澜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到任，所以潘梓年实际主持全面工作。此后，他又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建校伊始，白手起家，潘梓年带领全校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没有校舍，学员们就住在当地农民让出来的空房，铺上麦草就是床；没有教室课桌，两腿上架一块木板就当课桌，树荫下、打麦场，甚至马棚、破庙也都成了上课教室。师资缺乏，潘梓年常常担任几门政治理论课的主讲，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20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把政治理论课讲得既深入浅出，又新鲜活泼，使学员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

1949年5月，潘梓年被调到武汉担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等职。他虽身兼多职，但没有忘记对中原大学的关心，时常到该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各种教师座谈会，具体了解院系设置、师资力量、教材和设备情况，听取各种意见，竭尽所能帮助该校健康快速发展。

尽管潘梓年在中原大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革命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人宽厚，办事认真、执着等高尚的品格，成为中原大学的光辉旗帜，并犹如一本魅力永存的教科书，熏陶教诲着后继者。如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内，就矗立着潘梓年的雕像，校园内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梓年路”，让潘梓年老校长的革命精神永远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以教育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